

当代中国文学学家文库

杨义

卷

文学地图与文化还原

——从叙事学、诗学到诸子学



DANGDAI

ZHONGGUO

WENXUEXUEJIA

WENKU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文学学家文库



文学地图与文化还原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地图与文化还原—从叙事学、诗学到诸子学/杨义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1
(当代中国文学学家文库)
ISBN 978-7-303-11565-5

I. ①文… II. ①杨… III. ①叙述—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②诗歌—文学研究—中国—文集③先秦哲学—文学
IV. ① I206-53 ② I207.22-53 ③ B22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9568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55 mm×235 mm
印 张: 22.75
字 数: 361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6.00 元

策划编辑: 赵月华 责任编辑: 赵月华 王 强
美术编辑: 毛 佳 装帧设计: 毛 佳
责任校对: 李 茵 责任印制: 李 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展开人文学之“返本创造论”

——治学答问（代序）

一、还原诸子的五条脉络

问 最近您发表了一系列讨论先秦诸子的论文，如《〈论语〉还原初探》《庄子还原》《韩非子还原》等，境界独辟，新人耳目。这些文章在几家重要刊物头条发表后，《新华文摘》转载时均列为封面要目，引起了大家的浓厚兴趣。在写完《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后，为什么您转而研究先秦诸子？您的研究思路是什么？

答 学问的追求，在于文明之真、智慧之妙和人生之美，因此突破畛域而转变视野，就像风行水上，自然发生，是学术内在的精神逻辑和学理逻辑不得不如此延伸与发展的必然结果，不应该用人为的学科分割加以限制。我本来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返本求真的意识使我转而研究古典文学，不知不觉已有 20 年。进入到古典文学领域，我先从熟悉的小说着手，进行叙事学和文化学的探讨，但是，要想真正了解中国文化，还必须深入中国诗文，探究其中的人文意趣。所以，我又研究了李杜诗学、楚辞诗学以及宋元时

期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文学。对于少数民族充沛的“边缘活力”进入文学史的主流叙事，实在是我致力颇勤之处。这两年，我的精力主要都放在了研究先秦诸子的发生学上面。就这样，在明清、唐宋、魏晋、先秦分别以专家之学的方式“打了几个桩”之后，我又开始思考文学的整体观问题，进入到对文学、文化、文明相互关系的整体考量当中。因为只有站在贯通古今、会通多域的角度上，才能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个精神谱系是如何发生、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变异的，它留给我们什么，它昭示着什么，从这个基础上来思考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包容性，思考国学的深层脉络及其精神内核，才是直指根源、有理有据的。

说到还原诸子，我觉得可以从五条“脉络”入手，分别是家族脉络、地理脉络、诸子游历的脉络、年代沿革的脉络以及诸子的编辑学即成书的脉络。发生和还原的关键点，是要回复诸子生命的原本，这可以概括成两句话：一是触摸诸子的体温；二是破解诸子文化的DNA。发生学就是返本学，返回事物发生之根本的学问。我们两千年来诸子学史和经学史到底做了什么呢？这些要心中有数，探知虚实，从众流纷涌处，考察众流所自的本源。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首先强调文本的细读和通悟，然后通过文本与多种材料、多种方法相互参证的综合解读，发现前人未曾涉足，甚至遮蔽了的可开发空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只有在根本处发现可开发的空間，才能窥见诸子之道是如何发生的。有创造性空间，才有研究者的位置。

根本之为根本，它是从土地吸收养分的，不能将它悬空而虚玄化。当我们追究先秦诸子创造思想的过程时，必须看到，诸子面对两个系统的文化资源：一是书面文献系统，但记述有限、流失严重。人类使用文字仅有三四千年的历史，而人类开口说话已十万余年。民族回忆和民族想象，许多部族的起源、部族领袖的业绩，其迁移、战争和文明创造，在漫长的岁月都是靠口耳相传，甚至出现专门的巫师和歌手吟唱，这就形成了另一个更为原始、古老而不乏变动和想象的民间口头传统。过去疑古派的先生们忽视了或混淆了这样一个民间传统，把口头传统的记录说成是假托的。诸子创造自己的思想，可以从文献中寻找依据，但是先秦时代文献很有限，史前的许多记忆靠民间口耳相传。这个资源成为诸子汲取广泛的民间智慧，超越官方传统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支撑点。诸子不是先看了西方哲学史或者前人著作来写书，而是要解决他的家族、部

族、国家存亡问题和个人的安身立命问题，“救世之弊”，进而体验天道、世道、人道。在体验中，他们动用了许多民风民俗、口头传统，将之转化为原创的思想，这种思想不同程度地具有原型的意义。

不妨打个比方，如果我们从单打一的角度看文献记载，就像在水果摊上看水果，但是这个果子是怎么来的？通过对发生过程的多学科、多角度的综合研究，就能看到它怎么生根、长叶、开花到结果的整个过程。过程是生命的演习，是思想生成的方式，往往比结果更为重要。

问 您在这些文章中又开始尝试新的研究视角，您称之为“于文献处入手，于空白处运思”。也就是说，史料与史料之间的“缝隙”与“空白”，也一样可以成为学术的生长点。请您具体谈谈。

答 研究先秦诸子学术，是对两千年的学统亦步亦趋、陈陈相因，还是以新世纪的大眼光，发现和解决两千年没有解决，或未曾提出的深层的实质性的问题？这是当今一代学术命脉所系的大关键。前人对诸子的版本、文字、义理已有不少坚实的研究，之所以提出诸子发生学的命题，是要在以往研究较为琐碎，把文字当死文字来读的偏颇之处，还原和把握先秦诸子的学术生命形态。做到这一点，我们起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可以利用许多新的资料，除了历史文献，还有大量发现的出土文物文献、口头传统和文化人类学资源；二是以多维的研究方法，以现代意识把历史考据、简帛释证与民族学、家族制度、姓氏制度、民俗学、礼学制度、年代学等研究方法相综合；三是我们拥有博大的文化姿态，不是为了崇圣，不是为了制造某种潮头，而是为现代大国打好文化根基。具备以上三个条件，我们就有可能发现和把握到前人没有看到，或失之交臂的一些基本问题，尤其是透过历史烟尘和历代学术的曲折，去弄清诸子是谁，不仅是血缘上“他是谁”，而且是文化遗传、文化基因、文化脉络上的“他是谁”。这是发生学研究诸子为道之本的关键点。世界不仅是既成事实的集合体，而且更是过程的集合体。既然诸子是以人类原始生存智慧和民族生存危机作为其创造思想的资源，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谁在创造思想，也就是创造主体的问题。只有了解谁在创造，了解其思想是如何起源、发端和演化，组合了何方、何样的文化元素，才能在内在精神深度上，揭示诸子学说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做到“本立而道生”的。

由于诸子的家世、生平资料在先秦两汉载籍中缺乏足够的完整性，

存在着许多缺失的环节，历史留下的空白远远大于历史留下的记载，这就使得诸子生命的还原成为学术史上难题中的难题。但是空白并不等于不存在，认真地考究为何留下这样的空白，如《春秋左传》为何不载孙武，《战国策》为何不载屈原，《史记》为何墨子面目模糊，如何通过史料和考古材料上的蛛丝马迹去破解这些空白，反而能够得到更深刻的发现。这里存在着一种重要的学术方法，以敏锐的感觉进入有意义的空白，清理和发现诸子的生命如何沟通着他的文本与他生存于其间的部族、家族、民俗、信仰、口头传统之间的联系，就是有可能进入思想原本的深刻处。

这种学术方法，就是“于文献处着手，于空白处运思”。就拿庄子来说吧，庄子身份音影模糊。为何生长在宋国蒙地的庄子充满着只有楚人才有的思想？有三个千古之谜需要回答：其一，为什么楚威王会礼聘只是小小的宋国漆园吏的庄子去作大官而庄子还不愿意？其二，在那个学在官府的时代，穷困潦倒的庄子知识从何而来？其三，地位低下的庄子凭什么资格破衣褴褛地与诸侯将相打交道？“庄子是谁”的问题不解决，许多问题都难得要领。这就要调动各种考据手段，从先秦时期家族制度、姓氏制度的角度入手解决问题。据《史记》记载，楚威王时期的将军庄蹻是楚庄王之苗裔，这印证了庄姓得自于楚庄王的谥号。《通志》也说“庄氏出自楚庄王”。庄子乃是楚庄王二百年后的疏远的后代，只是后来在残酷的政治事件中，庄子的家族受到迫害，逃到宋国，所以庄子出生在宋国。时隔四五十年，王位两次易手之后，楚威王想改正旧案，重新召回当年一些公族的优秀子弟为其效力，就想到了庄子。但是庄子却说：“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他的意思是与其回去当一头祭祀用的牛，还不如做一只在泥地里爬的乌龟，话语包含了对家族历史的痛苦感受。我们总说这是“庄子寓言”，但这类个人经历的表述，如果没有真实的底牌，那就有骗子之嫌。掀开隐藏的底牌，才能找到打开上述关于庄子身世之谜的钥匙。当然，我们不是为考证而考证，而是为了返回根本之处，使考证指向深层的意义，通解庄子整个思想是如何发生的，其思想的内在精神脉络、意义密码、文化基因与楚人的信仰、礼俗、口头传统存在着何种关系。所以，我说要把过程的思想变成思想的过程。一个疏远的逃亡贵族家庭在异国生子，这是庄子身世和庄子著书之间留下的不可能为官方文献直接载录的空白。《老子》说：“天地之

间，其犹囊籥（风箱）乎！”风箱没有空白就失去意义，空白也有哲学。我们用“空白哲学”来考察诸子文化基因的遗传和变异问题，就可能发现空白的深处隐含着千古的奥秘和无限的意义。

二、蕴藏在文献功夫和田野调查中的文化哲学

问 您在著述中征引文献的数量多、密度大、范围广，观点与材料浑然一体。《中国现代小说史》征引文献 5092 次；《中国现代文学图志》征引 2243 次；《中国古典文学图志》1828 次；《中国叙事学》（图文本）2272 次……可否介绍一下您在学术研究中对待文献的处理方法？

答 文学研究中的文献收集考证是个硬功夫，不锐意穷搜是不敢贸然下判断的，但是透过文献学看到它的文化意义是一种真智慧，不调动富有悟性的分析能力，所得也是有限的。方法得智慧而生，方法失智慧而死。要以高度的智慧面对重重厚积的文献材料，从中化出深层的意义。我在谈“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三个学理问题时，曾经谈到文献的使用问题。我主张在文献验证、考证的基础上，增强文化意义的透视。这是文学研究者应该认真处理的方法论问题。文献的考证是一种硬功夫，硬在材料的搜集、整理和辨析上尽量做到“竭泽而渔”。前人使用过的材料，你在更深的层面上使用了；前人没有发现其关联性的材料，你发现其关联性了；新出现的出土材料和档案材料，你率先纳入考察的范围了；那些散失在群书中被隐埋、被遮蔽的材料，你使之重新发光，而且联成一气，进入学理逻辑之间了。进而言之，从文献的考证中透视深层的文化意义，需要在学理创新上充分发挥感悟能力和思辨能力，这样文献就成了燃料，积累越厚，思想之光就越亮。应该看到，没有意义的考证是一种死的考证，经不起考证的意义是一种空的意义。如果我们要建立一种有效的文学研究的操作模式的话，我觉得不妨提倡一种“考证型的透视”，或者“透视型的考证”，用考证提供透视的基础，同时用透视来引导考证的方向。考证与意义连接到何种程度、何种层面、何种境界，实际上是检验一个人的研究能力的重要尺码。通过这种文献和文化的双重努力，文学研究就可能做实了，做大了，同时又做得跨越文学本身的边界，跟其他文化领域发生深度独致的关系。

问 杨老师一直重视从新的层面、新的角度来阐释文学现象和文化

问题。同时，您也非常善于利用新材料。记得去年您去欧洲讲学，当时，演讲题目是《空间美学：神凤与长江》，演讲中就使用了很多战国楚墓出土的文物资料，如凤斗龙虎刺绣纹样、虎座凤架鼓、虎座立凤木雕等。您对这些历史文物的解读，让人大开眼界。为了收集材料，您还花了很多时间、精力去全国各地做“田野调查”。请您谈谈“田野调查”对于文学研究者的意义。

答 “田野调查”在民俗学、民间文学的研究中，在口头文学研究中，是有它的传统的。但是作为一般的文学研究，这个名目的提出，也许算得上是我的一种努力。古人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要用自己的脚去丈量历史的脉络，把“田野调查”看成寻找土地的灵魂。说到意义，至少有四点。

其一，可以踏勘历史遗迹，增强学术研究的现场感。例如，研究欧阳修，到庐陵和不到庐陵感受是不一样的。到了江西的庐陵（就是现在的吉水），看到欧阳修留下了一个祠堂，一个泷冈阡表亭，睹物思古，怦然心动，就会很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农业文明的宗法文化、孝文化有着如此巨大的力量。欧阳修花了20年写了一篇《泷冈阡表》，写他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母亲如何勤俭持家，有仁爱之心，怎么教子有方，使他脱颖而出、光宗耀祖，母恩母德，念念不忘，这在《古文观止》中被选注者评为至情至性的文章。庐陵那里立了一座很高的碑，碑的前面是《泷冈阡表》，碑的后面是他家族的谱系，盖了一个高大、端肃而体面的亭子，就是泷冈阡表亭，谁人见此，不为之动容？不到欧阳修庐陵故里，可能只注意欧阳修的名赋美文（如《醉翁亭记》《秋声赋》等），但一到庐陵故里，你就会情不自禁地给这种宗法文化、孝文化写上一笔。踏勘遗迹，就能进入历史的情境，看历史上哪些东西留下来了，哪些东西受到人家敬仰。假如来到苏州的石湖，范成大的石湖别墅还在，范成大纪念馆里面还有《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被刻在碑石上，寂寞地摆在那里，但是几乎看不到参观的人影。石湖别墅不远就是横塘，横塘是在宋代诗词中发过光辉的地方。贺铸的“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表达对幻美的追求和幻美失落后的惆怅。范成大也有一首名为《横塘》的诗：“南浦春来绿一川，石桥朱塔两依然。年年送客横塘路，细雨垂杨系画船。”锦心绣口的诗词，描写山川秀美，那种情感就像清泉在你心头荡

漾着微妙的波纹。你现在去看横塘，桥还在，塔依然，但是旁边是一个什么工厂，“绿一川”看不到了，“细雨垂杨”也无影无踪了。通过田野调查品味历史的沧桑，体察人和自然相处的状态，你对如何留住诗的美就会有新的体悟。田野调查提供应该开阔的空间，激活人的历史透视和文化想象。

其二，可以收集地方文献，增强文献论证的丰富维度。文学的“田野调查”为研究者进入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到了当地，你可以看到很多别处不多见的文献。地方一般都还是以本地的文学家这类历史名人为荣的，所以对他们的著作，甚至流传于民间的逸事整理得比较细致，有的甚至出过全集，也舍得花力气去精心搜集各种各样的碑刻、图像和画集。要搞图志，只要到了山东淄博蒲松龄纪念馆，就可能买到两三种蒲松龄的画册，里面有几十种名篇写意图和蒲松龄像，而且还可以看到他的故居、他的坟墓、他父母的坟墓和他的草寮，这些都会给你很深的印象，提供很重要的知识背景和地理的历史的背景。到了刘邦家乡沛县的大风歌碑博物馆，你还可以听到与《史记》所载不同的另一个“刘邦斩白蛇起义”的故事，说刘邦在丰泽西斩白蛇时，白蛇开口说话了：“你斩我的脑袋，我就报复你的脑袋；你斩我的尾巴，我就报复你的尾巴。”刘邦挥剑把白蛇从中间斩断了，结果出了一个王莽，把西汉、东汉从中间斩断了。这个故事当然是东汉以后才出现的，它提供了一种对历史命运的吊诡的解说，渗透着一种幽默的民间智慧。

其三，可以考察作家的家族状况，增强对作家的文化基因的透视。古代作家的后代可能还住在那里，幸运的话还可以看到他的族谱，看他的家族是怎么迁移、联姻、形成文化家风的。例如，到曾巩的故乡江西南丰，就可以看到曾氏家谱，结合曾巩和王安石的文集，就会发现曾家、王家，还有一个吴家，三个大家族的连环婚姻状况。曾巩的祠堂，曾文定公祠把他辉煌的家族史都展览在那里了。两宋曾家出了51个进士，曾巩的姑妈就是王安石的外祖母，这样的关系对北宋的文学、政治（如党争）都产生过很深刻的影响。走近作家的家族，就走近了作家的文化血脉，感受到他们的乡土资源、家教家风、意趣神采。

其四，可以跟地域文学的专门研究者进行全国性和地域性的对话，拓展研究者的思维空间。“田野调查”可以领略历史遗迹的存废，收集地方的文献、画册、研究集，除此以外，还可以同地方文史的研究者就

相关文化疑难、民风民俗之类的问题进行探讨和商榷。当地的研究者对家乡文化、家乡名人多有一种自豪感，对这些血肉相关的领域研究得比较深细，可以和我们优势互补。例如，河南文学院写了一本《河南文学史》，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唐以前的中国文学史有一半是河南人写的”，并且为这种地理的历史文化优越感，列了种种的证据。你到了河南之后，就会由此思考历史文化中心的转移和由此形成的文化史分期问题。文化中心的转移，往往联系着拥有诗书传统的大家族的迁移。在南北文明的冲突中，家族迁移的轨迹如何？轨迹中又蕴含着什么意义？晋朝永嘉衣冠南渡，河南陈郡的谢氏家族就迁移到南方，成了淝水名将、乌衣巷子弟以及山水诗开创者。山东琅琊的王氏家族也迁移到南方，“王与马（晋王室司马氏），共天下”，王谢两个家族有作品存世的文学家占了南北朝的八分之一。王谢这样的大家族之所以名人辈出，一是由于当时门阀制度下的教育条件；二是他们的诗文有抄写出版的条件，得以传世，家族的条件提供了培养文学人才和传承文学文本的经济基础。黄河自宋朝庆历年间以后十年九患，造成中原生态环境的荒芜和文化中心的南移，实地考察会加深历史的沧桑感。我曾经去过李贺的家乡，在河南西部偏远县份的一个乡镇里，街头有一个小亭，名为李贺故里纪念亭，旁边墙壁上是一幅画着大美人的摩托车广告，不远处一条几乎断流的溪流，觉得它可能就是昌谷。找到了当地的李贺研究会会长，一个地方农业银行退休的干部，热心地带我们去看李贺故居，找到了一座元代石碑，记载着李氏家族在哪在哪。碑体横卧在地上，断成两截，农民还在碑身上晒大葱呢。出了村子，我又看到一座乾隆时期的魁星楼，找到了一座唐代古塔。想当年，李贺骑着一头瘦驴，沿着昌谷去寻找诗，有了好的句子就写下来扔到口袋里，此情此景，就进入了一种疏野荒凉的临场感。在山西万荣县看秋风楼，就是汉武帝写《秋风辞》祭后土的地方，“秋风起兮白云飞”。古代最大的后土祠原本建在黄河的沙洲上，沙洲叫做“脍上”，脍就是屁股了。地在汾阴，是汾水和黄河夹着的沙洲，为生育之神所居，女娲抟黄土造人就在沙洲芦苇荡的深处。从秋风楼的小册子和与当地文物部门人士的交谈中，你对古人的信仰，古代的神话传说都有了更直接的可以引起你考辨兴趣的乡土资源。与秋风楼隔着黄河相望，对岸就是陕西韩城司马迁的祠堂，史学大师和女性祖神遥遥相对，看了之后就会体验到许多书本上没有的念天地悠悠的邈远感受。

我提倡人文学科研究方式上的“五学”，即眼学、耳学、手学、脚学、心学，“田野调查”属于脚学。文学的“田野调查”让你进入情景，你会不断地在天地山川的辽远空间中，追寻着、思考着人与土地之魂。《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能远，才能更深刻地返回根本。在前人曾经登临怀古赋诗的地方，思考着历史是否可以和如何能够复原，情景现场产生了“文化回音壁”的效应，遗址撞击着心灵，访谈纠缠着思绪，文献修补着残缺，田野调查可以激发你对历史的深层沉思和对文学的透彻感悟。

问 严耕望先生在《治史经验谈》中有一个说法，他说，真正高明的研究者“是要能从人人能看得到、人人已阅读过的旧的普通史料中研究出新的成果”“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在这一点上，您给人的印象深刻，比如李白、杜甫，研究成果汗牛充栋，经常感到话被前人说尽了，您在《李杜诗学》书中却仍有那么多话可说。如何在常见材料中开发“新生机”？

答 首先是读书要读出自己的感觉，要联系着自己生命上敏感的弦。激活每一个材料，使之成为会弹拨的指头，拨响你心灵的弦，催化你的知识生成机制，接纳外来知识，使之生下知识之根，结出智慧之果，此根此果成为自己的精神关注点、学理生长点。例如，在文化地域性问题、“胡化”和汉化问题上，建立一条特别敏感的神经，读到与它相关的材料就会眼睛发亮，比如说契丹文字是怎么形成的？契丹的图书馆中有多少北宋版的图书？金人是怎么创造他们的文字的？金人把契丹人、回鹘人等都集合在黄龙府居住，他们共同的交往语言又是什么？是汉语，汉语是他们民族之间交流的公共语言。对于这类材料，由于我有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关注的焦点，读了之后就心弦颤动，回响着材料内蕴的“胡化”或汉化的方向、轨迹和脉络的微妙声音。有感觉才能把材料化入自己的血肉，把很多材料组合到你的文化阐释体系中，给它们以合适的位置，使它们都活起来。你不断地读书，你的精神脉络就会不断地生成，不断地伸展，一旦有新的材料，你的精神脉络就会更加活跃和深入。李白《朝发白帝城》中有一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这个“还”字就很关键，读懂这个“还”字就读懂了李白。李白59岁流放夜郎遇赦，他总共活了61岁，若是农业文明中的人，他应该落叶归根，“还”到蜀地的青莲乡。但他是客商之后，故里没有高门

巨族，一还就还到江南，漫游洞庭湖，客死当涂县。曾经称李白为“谪仙人”的贺知章写过：“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这一回就回到故乡会稽，因此李白的“还”和贺知章的“回”是具有不同的精神指向的。李白的潜意识中有“胡地”的因素和或商或侠的成分。

其次研究某个问题，一定要对目录学、文献学多有关关注和广为储备，对这个领域及相关领域有哪些重要的书、重要的研究成果，心中有数，直至于如指掌。这样再调动或弹拨心灵那根弦，以你的关注焦点照亮材料的缝隙，在联想、比较和贯通中激活材料的生命，让材料立起来、蹦出来和你对话，同时也要做一些笔记，要把读有心得的材料记录下来，加以归类，标出关键，日积月累，就可分出层次，理清逻辑，深化思想。读十遍不如写一遍，一旦动笔为文，你就得苦思冥想，追问这些材料的价值何在，从什么角度才能发现其真正的价值，须动用自己既有知识的哪一部分与之构成对话关系，经过不同层面和角度的反复追问，才可能把看似无生命的材料化入你的知识网络之中，升华你的智慧境界。你只有具备了网络，这些关注点，这根弦，你才能够把材料读好、用好。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面对那样浩瀚的文献材料，你不可能都读完，但对你而言具有重要性的材料，就不可不读，而且要带着问题读，读出感觉来，读出生命来。那些材料经过记录整理和消化之后，你就忘不了，因对过话，混合着你的血肉。你不只看到了材料的面，而且看到了材料的根、材料的心。所以，我觉得消化材料的办法在于不断思考。可能开头思考的时候，你设想的弦拉得有点偏离，但是读而思的时候有弦胜于无弦，此弦可以根据新的材料不断地调整，或者进行纠正、延长，甚至分叉成网，这都很正常。我的问题讲演，这次讲的比上次讲的可能多出了那么几句话，或者增加了几则材料，增加了新的分析、新的发挥、新的引申。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有一根弦在那里，张弦以待，事过留声。所以，我说我这个人比较笨，不是靠一两篇文章暴得大名，而是靠不断地写，不断地往前走，总是今天看着昨天的东西不太行，过个三年五年之后，就会发现某个问题还有很多新材料可用，或者说还应该说得更好，做更深入的引申。你原来的知识体系、解释体系布满着很多弦，而且不断地增生，发生着新变，你的神经、触觉更加敏锐。以思想弹响材料的弦，又以材料弹响思想的弦，弦弦对弹，妙音自出，这对读书很重要，对材料的选择和运用也很重要。

问 在《现代中国学术方法通论》一书中，您对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曾有专门评说，您说冯先生“神游冥想于古代材料的神髓脉络之际，使一部中国哲学史不是仅有空架子，而充盈着血肉生命……”这未免让人联想到您个人的学术风格。您近期在研究先秦诸子时，又有“触摸诸子体温”的提法，为什么如此强调学术研究中的“生命体验”与“悟性透入”呢？

答 我曾说过，我之研究文学，非常推崇悟性。文学是人的表达，它本身就充满了异常灵性，研究文学而没有悟性那是不可想象的。感悟是个奇妙的东西，在我看来，它是中国智慧和思维能力的传统优势所在，是中国文化中的一种诗性的潜哲学，它在本能、认知、情感和理智等许多层面，都曾给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不少奇妙的融贯和升华的通道，在做诗、治学和求道中，感悟运用得妙，就能使你的智慧潜力在刹那间得以敞开，就可能知天地之道，觉天地之心，察天地之机，正如钱锺书所言：“学道学诗，非悟不入。”

做学问，不仅要知道历史上、文本上或文学史上客观地存在什么，更重要的是要捕捉到你看见了什么，所以要重视自己读书时的第一感觉。应该认识到，第一感觉是阅读者活生生的生命的瞬间闪现，如电光火花，虽然零零散散不成体系，但包含着思想的新芽，因而是非常宝贵的，要重视它，抓住它，论证它，展开它，而不要急急忙忙地招来很多重重叠叠的概念，蒙蔽了自己的眼睛，使第一感觉褪色，不经意地溜走。第一手材料和第一感觉，我们有必要争这两个“第一”。现在有不少博士论文缺乏创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阅读材料缺乏感觉，对自己的第一感觉重视不够，却用别人（尤其是外国人）的感觉代替自己的感觉。他分析一部作品，老是说别人如何如何讲，直到最后也没有写出自己的感受。他分析一个问题，老是说20年代怎么讲，三四十年代怎么讲，50年代怎么讲，现在的人又怎么讲，同意哪个不同意哪个，但到最后就是没有写出自己的感觉，以别人的东西淹没自己作为研究者应有的感觉；有些人离开外国拐杖就走不了路，从一个又一个外来概念出发，然后找一些本土材料来做例证，概念既不是他的发现，又是西方那套话语体系的皮毛，于是立论就不知不觉地做了概念的俘虏，唯独没有自己的创见。原创的思想是新生的草，能开鲜丽的花；贩来的概念是晒干的草，老吃干草是会便秘的。这是非常令人不安的治学路径，必须引

起大家的警觉。首先要重视第一感觉，那是自己的内在生命与材料所蕴含的另一个内在生命进行对撞的精神振荡，振荡波中有感悟的通道、思想的胚芽。

但是，仅有这个“悟”行不行呢？不行。感悟应该建立在阅读大量原始材料和研究资源的基础之上，把学术研究首先当做一种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艰苦磨炼，非从读书破万卷的深厚扎实的材料文献功夫开始不可。缺乏材料文献之米的巧妇是难为无米之炊的。冯友兰先生在谈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时，提出了搜集史料要“全”，审查史料要“真”，了解史料要“透”，选择史料要“精”，这全、真、透、精四字诀，值得认真记取。陈垣先生做学问，过去在广东时接触到《四库提要》，恨不得要把四库全书都读一遍，后来到北京当众议员，又当教育部的次长，遇上承德文津阁的四库全书移到北京，他大喜过望，整整花了十年时间，一有时间就从早到晚到那里去，把中国文史文献的家底摸了一遍。这样他再做什么选题，材料了然于心。当然，十年时间尚不可能把四库全书全读一遍，但浏览是很重要的。有些文献要精读，甚至背下来，有些文献必须浏览一下，知道哪个地方有这类材料，派上用场的时候就能够左右逢源。胡适不是说，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来要能高吗？像金字塔一样，底下很大，尖端的研究才能高而不危。学术要成大器，首先要在文献功力上固本强基。

问 陈寅恪先生有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请问杨老师，在您看来，20世纪中国学术出现了或者说面临着哪些“新问题”？

答 20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发展，长期处在频繁的思潮变换和激烈的中西文化碰撞及对话之中。众声喧哗，各种文化思潮和学术体系以不同的声音、言语、观念，诉述着自己的合理性，于是热闹中求深沉，一些视野开阔的学者面对丰富的智慧闪光和思想要素，开始了不同形式的创造性综合或综合性创造。学术在质问和反观自身时，它发现自己的生成和存在方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第一，视野和视野中的对象改变了。现代世界视野的形成，西方数百年，尤其是近百十年历时性发展而生成的各种思潮、术语和思想要素纷纷涌入，经过译介、解释、应用和转换，在中国思想学术界沉积成或筛选出一种共时性的文化思想材料的布局，一种互为矛盾，又可以互相折射和吸收的思想回音壁。这种思想

回音壁的效应，提供了异常开阔的思想空间和文化阐释的可能性，在七嘴八舌中把中国数千年的思想文化资源惊醒了，激活了，它要求对话，要求创造性的解释，要求在去芜存精中再振自己的当代价值。第二，学术的身份和价值改变了。也许某些学者心中还有“名山事业”的情结，但媒体和学府讲台的存在，使许多学术著作的稿本和讲稿未及精心打磨，即以比较明白有趣，甚至掺上水分的方式面对社会公众和莘莘学子。学术成为人师或业师的文化手段，在世俗的层面上，它甚至成了稿费和职称薪水的交换物。第三，学术的生产场合也改变了，寂寞的书斋之外，还有热闹的会场。会场有政治性的，有文化思潮性的，也有学术交流研讨性的。学术也由此出现了启蒙性、开拓性、建设性和投机性等不同的流派。相应的，中国传统学术的关注中心也发生旁移，由经学而诸子而佛学，再移至史学、杂学、俗学，逐渐淡化和消解了原本以儒家道统为中心的价值结构。

有新问题、新层面、新角度，则学术变活；无新问题、新层面、新角度，则学术变死。死活之机，不可不究。西方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20世纪的思想文化思潮如波浪式起伏涌进，拓展了新的思想维度、话语形式和学术科目。据统计，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级学科23个，重要的二、三级学科100个以上。百科并存，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学术的生态系统，改变了天下士人皓首穷经、注疏经籍、苦练制艺的单调封闭状态。知识的多样性刺激了对之进行多方探索的欲望以及进行融会贯通的要求。一方面，深度的知识学科分割，对于原生形态的文化生命的整体性是伤筋动骨的，分门别类的知识精深化隐藏着某种人为的、机械的文化割裂；另一方面，人文学术是中国人借鉴和接受西方知识分科的方式，重新清理、阐释和认识自身文化的学术体制，新的学术框架既拓展知识开发的巨大可能，又带来了对中国经验和智慧的概念性把握，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有时是带根本性的错位与混淆的。这就在历史的深处，提供了对新世纪学术的既具返回过去的

三、“文学地图”的学术史意义

问 有几个词汇，经过您的持续阐发，已经产生了全新的学术意蕴，成了人文学科的热门“关键词”。在学术期刊网上检索后发现，您的相关观点被广泛引用，如“感悟”“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边缘的活力”等。您有一枚闲章，上刻“绘中国文学地图人”，为什么要“重绘中国文学地图”？

答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是一个旨在以广阔的时间和空间通解文学之根本的前沿性命题。它并不以拼贴时髦概念或追风逐潮为务，而是坚持一点真诚，对中国文学文化的整体风貌、生命过程和总体精神进行本质还原，以坚实的建设引发革命性的思路，在博览精思中参悟挑战性的见地，借以为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提供富有生命活力和美学情怀的人文学术根据。这个命题的提出，本意就是要在强调知识的坚实性、可靠性、渊博性的同时，再向前走两步：一步是文学史融入智慧；一步是文学史进入过程。

我们之所以要“重绘”，在于绘制中国文学地图，这不仅涉及文化态度和学术方法的改革，而且涉及对地图的基本幅员和基本风貌的认知，涉及我们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与文学发展的整体看法，具体有三个层面的原因：第一，以往的“绘”是不完整的，基本上是一个汉语的书面文学史，忽略了我国多民族、多区域、多形态的、互动共谋的历史实际。第二，以往的绘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唯一的、简单的模式化。相当数量的文学史基本上沿袭了时代背景、作家生平、思想性、艺术性和他们的影响这么“五段式”的写作，忽略了文学发展和存在的网络形态以及对其多层意义的具有现代深度的阐释。第三，以往的文学史过多地套用了一些外来概念，不同程度地忽视了中国文学原创智慧的专利权。所以，我们要拓展研究对象发生和存在、发展和变异的开发范围，在博学深思上做到文学与文明互训、中原与边缘互动、文献传统与口头传统互生、古代与现代互贯。以这四个“互”，或者说四个文化系统的互文性，来展示文学——文化——文明的整体性，就必须革新我们原来的文学观念，必须确立一种新的文学史观，赋予文学生命的感知形态以一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内在穿透性。